

中国 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1895 - 1945)

李钧◎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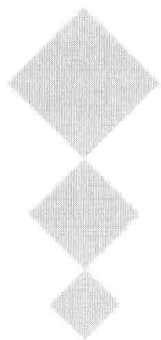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2YJA751033)结题成果

中国 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1895 - 1945)

李钧◎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 - 1945 / 李钧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4

ISBN 978 - 7 - 5203 - 0109 - 1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民族主义—文艺思潮—研究—
中国—1895 - 1945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765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李树琦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1.75
插 页 2
字 数 506 千字
定 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朱德发

“真学者”在竞相创新争优的学术平台上，往往是不显山露水的；然而一旦显露，其耀目的学术风貌与思想光彩即令人惊喜、使人赞佩！记得10年前李钧教授的第一部专著《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问世时，我曾评说：“它所研究的具体对象虽是20世纪30年代小说主题，而真正的学术目标却是从理论建构与写作实践的有机结合上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进行卓有成效的尝试，至少为重写30年代断代史作了成功的探索，也为整个文学史的全景观书写提供了一个新颖独特的叙述范式。”同时该书的创新趋优，“充分显示出作者具有独立驾驭重大研究课题的气魄、胆识和才华，更富有那种虚心好学、勤奋向上、废寝忘食、深钻苦研、为文去忧、唯书是乐的‘真学者’（梁启超语）的治学精神。”^①恰好“十年磨一剑”，若说第一部专著所磨的利剑在迎接科研的挑战中仅仅是初露锋芒，那么经过10年酷暑严冬的淬砺所磨出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这把剑，则寒光闪烁，锐气逼人。这部学术著作，不只承续了他第一部专著所开创的学术范式以及研究主体“真学者”的治学精神，而且研究本体对象在深广度上有了重大突破，研究主体的思维更新、治学智慧和学术个性更有充分而显豁的展现，其学术文本也成为作者在人文科学研究征程上树起的一座令人赞赏的夺目丰碑！

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没有大胆的突破就没有学术硕果，尤其人文科学研究的突破既重要又艰险。尽管这是众所认同的研究规律，然而在科研

^①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8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195页。

实践中能够对所选课题坚持多维度全方位突破研究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从纲目设计到内涵阐述给人以全新的学术冲击，仿佛进入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认知世界，足证研究主体在突破中求新、在求新中突破的逻辑循环内下足了力气使尽了功夫。这主要体现在：其一，选取“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作为研究对象，突破了学术界既有的选题范围，对复杂形态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从理论与创作相互关联的两大维面重新规范整合，这给研究对象带来既深且广的拓展与“创新”领域。“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系统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中，长期以来主要是被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即使到了“拨乱反正”时期也没有得到完全“解禁”与解放。虽然近几十年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引起不少学人的关注，但是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实在罕见，大多还是支离破碎的零散研读，未形成有学理深度和史学体系的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成果。《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所规范的研究对象具有前所未见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止，这“始”与“止”正值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发生最激烈冲突之际，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得以勃兴与高涨，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也得以昌盛。以这50年来规范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合乎原生态的客观真实律，又有强烈的忧患感，告诫国人昔日仇寇亡我之魂不散。因此所研究的对象不仅在纵向上有晚清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民初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五四”时期的启蒙与救亡互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20世纪30年代政党相争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以及抗战时期全民共鸣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而且在横向上有不同的政治或文化生态——大陆与台湾、各民族差异互见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甚至还有大而广之的中与外、古与今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将这诸多的错综复杂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流派梳理出一个系统来，整合出一个体系来，是对研究主体的宏观学术视野、综合理论思维、渊博知识结构与纵横穿透能力的严峻考验；这也使得《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以自足的整体系统屹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多元共同体的总系统。这种梳理、规范、整合的逻辑运作，就是对原创民族主义文学的重新开掘重新发现；这样的开掘与发现不只突破了既有研究对象的藩篱，也以睿智的学术魄力克服了在规范整合过程中所遇到

的艰险，为书写主体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探索与阐释的研究空间。

其二，突破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已有的研究框架，亦完善了作者 10 年前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小说主题时所建构的叙述模式。作者完全根据重新整合的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在需求，以“生态文化学”文学史观为制导，营造了一种新颖的述史范式，重构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这种述史范式的重要功能特点有：（1）以“生态文化学”为方法论或文学史观，能够以平等的眼光对待一切文学现象，可以消除庸俗社会学及其方法论给文学研究带来的人为偏见，乃至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不良后果；它亦有利于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能够给出较为公正合理的判断。（2）文学史书写不能没有论的制导，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以史实为根据为基石，因为没有史实就没有文学史；生态文化学作为方法论恰恰强调史实的呈现，即史识或史线务必源于史实，真正做到论从史出。（3）书写主体的史学观在文学史建构过程中固然具有超越性，但是这种超越性必须以史料的丰赡性与实证性为根基；而生态文化学的文学史观则格外重视后者。（4）能够将宏观的探本式研究与微观的体验式评述有机结合起来，运用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互为主体的换位思考，从而发现各自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就导致凡是文学史上出现的作家作品在这种思维框架中都可以获得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些述史范式的功能特点也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文本建构中充分显示出来，这正表明书写主体营造的述史范式在重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中得到了卓有成效的运用，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做到了述史范式与研究内涵的高度契合：第一个层面上理清了 1895—1945 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流脉，探析了民族主义思潮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重写了一部清晰、系统、完整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第二个层面上从宏观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流变入手，上溯到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曾国藩“卫道变器”说和康有为“托古改制”论，而重点则对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辨析，旨在弄清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源流及其差异；第三个层面上着重解读政治民族主义文学和文化民族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阐释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美学特质，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有益资源。作者对于上述三个层面上的历史梳理、思潮辨析和文本解读，都是在“生态文化学”

文学史观的烛照与制导下进行的，这就确保了这部“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的“重写”具有更加新颖的学术气质与思想风貌。

其三，突破以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中残留的陈旧僵化的话语系统，竭力探索新的学术增殖点与内容创新点，重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的新话语体系。李钧教授为此所做的尝试与努力是值得尊重和敬佩的。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领域，凡是有卓越创造力、有学术个性的学者，都力图建构既具时代色彩又有个性烙印的学术话语系统。尽管不能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完全建构起了全新独创的学术话语系统，至少其学术话语富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与个性色彩；这主要体现于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创新性的理论探索所形成的卓识独见，及其相应的具体而贴切的表述与修辞上。本书所写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至少包括中国“近代文学”的尾声（1895—1916）、大陆“现代文学”的主体（1917—1945）和“台湾民族主义文学”（1895—1945）三大板块；为了缝合这三大板块之间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而造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结构性硬伤和裂缝，从宏观到微观来把握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有机整体，书写主体从多方面做了求真出新的探索和描述：首先搜求最新出版的有关民族主义思潮及其文学研究的史料，并将这些史料激活，从中整合出最前沿的理论观点，以调整或更新自己的理论思维；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层层深入地进行理论阐释，既有从思想层次对民族主义的界说，又有从诗性层次对民族主义的论述，也有从创作层次对民族主义的感悟，这就使“民族主义”这个多义的众说不一的思想范畴或美学概念有了创新理论话语。其次搜集港台地区有关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与大陆的学术研究两相比照，取长补短，确立能够容纳大陆与台湾两地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史观，努力探索两地民族主义文学的内在机制与线索，以弥合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书写有可能出现的裂缝；在这方面的探索所发现的新思想线索、新美学取向及其作出的有新意的言语表述，无疑增强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的话语创新度。再次“生态文化学”作为一种新方法用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有助于发现被其他研究方法所遮蔽所遗漏的史实史料及其审美文本中的新意蕴新诗性，特别是

能发现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政治、文化生态的主体结构和多彩景观，进而从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这两个新角度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主题学研究。运用新方法选取新角度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所作出的新勘探、新洞见、新发现，以及所给出的朴实简明、鲜活真切的描述，无不为此著铸新词造新话。最后是作者格外重视个案研究，精心投入文本细读。这是营造《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创新话语的最重要途径。如果说上编是重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的骨骼，那么中、下两编八章的个案研究或文本解读则是重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的血肉。没有血肉的文学史只能是一副空架子，缺乏血肉的文学史也是瘦骨嶙峋不成形态，唯有血肉丰满的文学史方能身健体壮；创新型文学史所需求的也不是陈腐僵死的血肉，而是鲜活丰盈的血肉；因此，书写主体只有对经典性的审美文本进行创新式解读，读出新意蕴，品出新诗性，形成新见解，铸就新话语，才能使重构的文学史的血肉鲜活丰满。《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的个案研究，不论是对《老残游记》《四世同堂》《呼兰河传》《京华烟云》等的重解，还是对《陇海线上》《大上海的毁灭》《黄人之血》等的重评，都达到了相当的审美深度、精度和新度，极大地充实丰富了本书的学术话语。

上述仅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考察并点评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如何突破创新以及创新点的主要体现方式，却足以说明它是一部“重写”型的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它的不可取代的学术理论价值、文学史价值、方法论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本课题所具有的重要文化意义、思想意义、政治意义乃至现实意义，李钧教授在《序论》中作了纵横捭阖的考辨和颇有深度、力度的阐释，尤其联系“中国梦”这个时代命题所作出的结论性判断更令人深思：“如果说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是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走向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文化自信，那么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主流的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是对中国现代化梦想的文学想象与艺术表达，她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梦’的来路，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不仅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更具有重大的文学史书写价值。”笔者不再赘述，请细读《序论》。

我更感兴趣追询的是，李钧教授在科研征程上看重“十年磨一剑”。剑不出鞘难见其锋，一旦剑锋出鞘便闪闪发光，这究竟体现出何种治学精神或学术性格？在我看来，一是由于研究主体真正感悟到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极左政治猖獗时遭受严重伤害，欲将“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任务进行到底，以“文化生态学”为文学史观或方法论，重新对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和20世纪40年代战国策派这两个所谓“法西斯主义”文学社团和流派，做出历史的公正评价，恢复其原生态的本来面目。这就必须从主客体两个维度进行深入而持久的探索与研究。李钧在10年前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做了潜心探索，不仅独自在图书馆埋头于旧杂志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而且设身处地地回到历史现场去感受去体验，为“民族主义文学”和“战国策派”这两个文学社团去“正本”去“清源”，这种坚韧的治学精神是值得称赞的！二是对于学术研究或教书育人，李钧教授旗帜鲜明地“反对急功近利”，他“深信教育和学术不能搞GDP或商品化，不能按市场法则来计算投入产出比，不能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金钱帝国出不了学术经典，货币哲学又岂能成为教书育人的法则？！教育和学术更要抛弃行政命令和‘大跃进’行为，那些随风漂流的泡沫绝不是大繁荣的表征，那花里唢哨的口号也回答不了‘钱学森之问’。”说得多么痛快，语语击中当下学术研究或教书育人的要害！只有把学术研究作为生命价值根基的学人，只有将治学的求真知获真理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智者，才能真正体验到“学术研究是一项充满发现和挑战的智力游戏，学人进入写作状态时就像游戏成瘾者一样乐此不疲、心无旁骛”，并能生发出“十年辛苦不寻常”（以上引文见本书《后记》）的豪迈之感。有了这种“其乐无穷”的学术感知，就能远离“急功近利”的诱惑，哪怕为打造学术研究的精品力作竭尽全力乃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至于为完成课题而废寝忘食或不分昼夜地博览群书、苦钻深研就更不算什么了。三是文学研究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文学作品主要是审美的感性世界，通过学术研究从中获取真理发现真知并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尤其重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可以借鉴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这就必须遵循文学创作的美学规律及其诗性特征重新解读重新评述大量的文学作品，从中选取经典性文本进行重点剖析。而这种解读或剖析所面对的并非赤裸裸的理性、思

想、人性，因为它们都被审美性或诗性包裹着或者天衣无缝地相互融合为一体，所以解读或剖析文学作品无不是审美性或诗性的解读或剖析，即使对其主题思想的解读或剖析也不是光秃秃的政治学伦理学说教，而是对诗性的政治主题或伦理主题的阐发，即使作品中人性密码的破译也不是干巴巴的人性展示，而是带着浓郁诗意的人性分析。唯有这样的解读或剖析才算得上地道的文学作品的解读或剖析。尽管不能武断地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的每篇作品读解都达到了诗性研究的高度，至少大多数作品的解读具有诗性研究的特征。这是这部文学思潮史书写的强项又是本书的亮点，也由此体现出作者不凡的艺术感悟力与孜孜不倦地审美追求的价值取向。

学术成果的质量高低，真正的决定因素是研究主体自身的优化程度。李钧教授风华正茂，才气横溢，知识丰实，视野开阔，思维敏捷，文笔机智，又有刻苦严谨、创新争优的治学精神；今后只要不忘初心，志存高远，孜孜以求，坚毅前行，哪怕在研究征程上偶遇麻烦或艰险，也一定会登上人文科学的“金字塔”顶！是为序。

草于2016年国庆前夕

序 论

民族复兴，中华有梦：中国现代 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意义

“民族”一词因为内涵外延不同、评判标准各异而在中外学界有数百种定义。在现代中国，梁启超、孙中山和钱穆关于“民族”的论述常被引为经典。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正式将“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学概念引入汉语，从此引起国人注意^①；梁启超认同伯伦知理的观点：“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具有八项特征，即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其中“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②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指出：“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nation）。‘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在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民族就是国族”^③。钱穆则认为：“立国第一条件是民族；所谓民族，乃由一种共同的生活信仰，生活理想，与夫共同的生活情趣、生活爱好而形成。”^④这些定义有一个共同内核，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页注④。

②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71—76页。

③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④ 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47页。

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②；“民族”是一个现代政治学概念，它不像“部族”和“种族”那样建立在血缘和肤色基础之上，而是在文化传统和现代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想象共同体”。

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有家族、宗族和“天下”观念而缺乏“民族国家”意识，那么“民族”一词的引入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就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标志。与 nation 相对应，nationalism 通常被译作“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③，而陈独秀译之为“民族国家主义”^④，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则译之为“国民主义”。^⑤ 但不管称谓有何不同，本质却是明确而统一的，即“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⑥。当民族与国家联在一起并演化为一种主义，就具有了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文化认同的内涵，因而当代学者钱雪梅将“民族主义”划分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三个层面，并认为这种认识论上的划分既不会破坏“民族主义”概念的完整性，也不会把“民族主义”简单化或片面化。^⑦ 郑师渠则认为：“民族主义有两种范式：一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一是以德国为代表，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互为表里，只是因各国情形不同，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而在现代中国，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同时并兴。^⑧

① [苏]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②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③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提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4页。

④ 三爱（陈独秀）：《说国家》，《安徽俗话报》1904年6月5日。

⑤ [日]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3页。

⑥ [英]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1页。

⑦ 钱雪梅：《文化民族主义刍论》，《世界民族》2000年第4期。

⑧ 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人们日渐达成的共识是: 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 它不仅塑造了现代国族文化而且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 成为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基础; 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 民族主义仍会以爱国主义等形式表现出来, 成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①, 正如在“振兴中华”和“中国梦”的号召中, 爱国主义已成为民族主义的合理内核^②。不仅如此, “新民族主义”作为 21 世纪的一股重要社会思潮, 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而受到当代学者和政治家的高度重视。^③

国外学界已对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众多经典著作。比如汉斯·科恩《民族主义的观念: 关于其起源和背景的研究》(纽约 1944 年)、苏·乔德哈里《印度民族主义的发展 (1857—1918)》(加尔各答 1947 年英文版)、卡尔顿·G. H. 海斯《民族主义: 一种宗教》(纽约 1960 年)、苏加诺《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泰戈尔《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 1982 年)、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冯克《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和史密斯《民族主义: 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等等, 这些著作对民族主义做出了多层面、多角度的系统论述, 为后世学者展开民族主义相关问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由于阶级革命理论与民族国家话语方凿圆枘, 而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一直存在龃龉冲突, 因而中国大陆官方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一度将民族主义话语“妖魔化”, 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更

① 王文奇:《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析论》,《史学集刊》2011 年第 3 期。

② 熊坤新:《关于民族主义论争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贵州民族研究》1996 年第 4 期。

③ 薄明华:《论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2007 年第 8 期。

是高度警惕；这使大陆学界长期回避民族主义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将民族主义文学视为敏感领域和学术禁区^①。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要义之一，中国共产党虽然在1945年以前将孙中山视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指导者，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曾在20世纪30年代提倡“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而1946年后国共意识形态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因此民族主义文学在整体上成为学术“带电区”。其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而大陆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对“民族—国家”话题有所避讳，担心引发地方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再次，李立三时代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幼稚病认为“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包含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必然涉及对中华民国史、中国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重新评价问题，这与“全盘反传统”的“现代化”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悖论，甚至可能会颠覆现代文化和新文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其实上述问题不仅不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障碍，反而证明民族主义思潮研究是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亨廷顿认为，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因素，但未来的全球性冲突将是不同文明的冲突，并断言文化民族主义将造成文明的冲突状态。^②梁启超则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就对“民族主义分裂问题”做出了回答，而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共产党人也对此问题做出了深入思考，为后世学者确立了民族主义研究的基本原则^③。对于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我们应当明确的是：共产主义与大同世界是人类的美好愿景，但在当前以及未来很长时期内，提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精神仍将是各国政治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必将成为“振兴中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基础。至于有人担

① 李晓峰：《集体记忆·文化符号·民族形象——论195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民族主义话语》，《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

② 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③ 参看王希恩《中国共产党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回溯》，《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张双智《近代民族主义视野下的西藏问题》，《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心文化民族主义可能导致复古保守倾向, 则更是皮相之见, 因为从来就没有“无传统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绝不可能在断裂中铺就, 而只能在汲取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摄取外来文明资源的基础上开创出来……正是基于以上认识, 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研究虽然起步较晚, 但已经取得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①

中国近现代历史证明, 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政治文化思想, 都曾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并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和文学思潮。不过, “近代中国出现过的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思想和政治运动, 其能掀动人心于一时者大抵皆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 并基本上假借着民族主义的动力”“一切与民族主义相冲突的现代化运动, 其最终的成就都是没有保障的。”^② 这是因为“民族主义者, 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火焰, 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 顺之者兴, 逆之者亡。”^③ 因此可以说, “民族主义不仅是近代中国一切现代化运动的基本动力, 也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基本思想形态或意识形态。”^④ 而在《马关条约》签署到抗日战争结束(1895—1945)的50年里, 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地位, 这是因为“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 岂有他哉, 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人人之胸中, 宁粉骨碎身, 以血染地, 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英雄哉, 当如是也。国民哉, 当如是也。”^⑤ 如果说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是摆脱半殖民

① 大陆民族主义研究著作可参看罗志田《乱世潜流: 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余建华《民族主义: 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 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徐迅《民族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唐文权《觉醒与迷误: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央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沙莲香编《中国民族性》(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联合报·副刊》1975年5月1日。

③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20页。

④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⑤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9页。

地半封建状态走向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文化自信，那么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主流的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是对中国现代化梦想的文学想象与艺术表达，她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梦”的来路，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不仅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更具有重大的文学史书写价值。

以诗证史：中国现代民族主义 文学研究的首要意义

霍布斯鲍姆将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A 阶段是文化、文学、风俗习惯等层面的交融时期，B 阶段是民族主义先驱推动民族意识扩大，并鼓吹借助政治手段建立民族时期，C 阶段是民族主义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时期。^① 这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和文化符号最初作为民俗和传说积淀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在特殊条件下被知识精英整合成原型母题，又被政治精英应用于创建民族国家的实践中，他们的英雄传奇反过来被作家们以史笔和想象形诸文字来教化大众，从而使民族国家获得合理性与合法性，最终达到固化民族国家“政统”和“道统”的目的。霍布斯鲍姆的观点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看法不谋而合：文学可以寓教于乐，能够通过“熏浸刺提”达到“新民”“新道德”“新政治”“新风俗”“新人格”和改良群治、创立民族国家的目标。而当梁启超和严复等人提倡译印政治小说之时，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也正式宣告启幕，自此，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同步：如果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②，那么1895年至1945年的民族主义文学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诞生、发展和壮大的全过程，具有以诗证史的意义。

① [英]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② [美]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于列强殖民入侵的历史背景下，民族与国家主体意识作为一种外源性的现代政治文化思想，其生成有赖于“他者”的存在。虽然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即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但彼时的中国人并未有沉痛之感，相反，当英国舰队在广州与清兵开战时，民众夹江围睹，如观游戏。直到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割去台湾”这一事实才让中国精英真正有了创深痛巨的危机感，他们开始为唤醒民众而奔走呼号。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意识到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因为“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凡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此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萌发了“改变中国”和建立“新中国”基本理论构想。现代中国第一代精英知识分子企图通过维新改良使老大帝国重焕生机，康、梁的维新鼓呼也很快转化为戊戌变法运动，但由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更由于缺乏民间大众支持，百日变法归于失败。梁启超远走日本后，改变维新策略，不再仅走上层路线，而是注重发动群众，改造民众思想，于是创办《清议报》《新小说》等杂志，接续黄遵宪“诗界革命”口号，发出了“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界革命”的宣告，目的是通过“新民”以实现救亡图存。正如梁启超为《新小说》拟订的广告词所说：“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②由此可知，现代中国文学在源头上即与政治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等作品展示了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想象，那么刘鹗《老残游记》等则表达了作者对于国家内政腐败的忧思和对民主法治的呼唤——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文学由此诞生了！而在宝岛台湾，武力抵抗与文化抵抗同时开展起来，表现民族主义思想主题的诗文也被爱国文人不断创作出来，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重要一翼。

同样是1895年，一批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团结在孙中山周围，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他们将五百年前朱元璋反元檄文中的“驱除鞑

①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全集》第二册文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40页。

②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1902年《新民丛报》第十四号。